

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审美观

曾繁仁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生态审美关系的分析与预见成为我们在新世纪思考与探索生态审美观的重要资源。马恩的共同课题是创立具有浓郁生态审美意识的唯物实践观, 包含尊重物种内在价值的生态意识。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重要著作中有关“异化的扬弃”的理论即包含人与自然关系重建的内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重要著作中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则成为阐释人与自然生态审美关系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彻底的自然主义; 自然的独立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 自然辩证法

文献标识码: A

生态审美观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种崭新形态的审美观念, 是在资本主义极度膨胀导致人与自然矛盾极其尖锐的形势下, 人类反思历史的成果。如果说活跃于19世纪中期与晚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这一理论形态, 那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作为当代人类精神的导师和伟大理论家, 他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已有所分析与预见, 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且就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 这种分析与预见的深刻性同样是十分惊人的, 从而成为新世纪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索生态审美观的极其宝贵的资源。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由于生态审美观的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 因此同生态哲学观具有高度的一致, 所以本文所论涉及马恩大量的生态哲学观, 但却同生态审美观密切相关。

马恩的共同课题——创立具有浓郁生态审美意识的唯物实践观

生态审美观的核心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突破了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 同时也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力主人与自然的和谐平等、普遍共生。因而生态审美观是一种具有当代意义与价值的哲学观。研究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实践观就包含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识, 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审美观的理论指导与重要资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开始于19世纪中期, 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带有形而上学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放置于对立面之上。黑格尔尽管创立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试图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加以统一。但仍是统一于绝对理念的精神活动之中, 完全

排除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费尔巴哈倒是充分肯定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与第一性，但他不仅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实践性，而且将人视为自然的创造者，断言人的本质即是神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p16)}恩格斯则通过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探讨明确宣布了形而上学的反科学性。他说：“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p621)}于是，在批判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以突破形而上学为其特点的新的世界观。这个新的世界观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唯物主义实践观。这是一种迥异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以主观能动的实践为其特点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p16)}对于这种唯物主义实践观突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弊端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更为具体而详尽的阐释。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间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p127)}马克思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与受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从纯理论的抽象的精神领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人的能动的社会实践当中才能解决其对立，从而使其统一。这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实践对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种克服，成为生态审美观的重要哲学基础。而且，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实践观中包含着明显的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马克思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3](p16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是费尔巴哈的自我标榜，但费氏所说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因而不是不彻底的。马克思认为，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应该是人与自然在社会实践中的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加以结合，并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演进的世界历史的行动。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中包含着“彻底的自然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尊重自然、自然是人类社会重要因素的生态意识。

在这里还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不仅包含明显的生态意识，而且包含明显的生态审美意识。这就是非常著名的马克思有关“美的规律”的论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时讲了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他指出：“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已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pp96-97)}首先，我想说明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之中包含着明显的生态意识。也就是说，所谓“美的规律”即是自然的规律与人的规律的和谐统一。马克思这里所说“尺度”(standards)其含义为“标准、规格、水平、规范、准则”，结合上下文又包含“基本的需要”之意。所谓“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即广大的自然界各种动植物的基本需要，“美的规律”要包含这种基本需要，不能使之“异化”，变成人的对立物。

这已经带有承认自然的价值之意。因为，承认自然事物的“基本需要”必然要承认其独立的价值。而所谓人的“内在的尺度”（Inherent standard），按字面含义即为“内在的、固有的、生来的标准和规格”，即是人所特有的超越了狭隘物种肉体需要一种有意识性、全面性和自由性。但这种有意识性的特性应该在承认自然界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这就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其次，我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是其所创立的崭新世界观——唯物实践观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p19)}由于这个提纲是马克思于19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在笔记本中的，当时并未准备发表。因而不可能展开。为此，我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改变世界”应该包含“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所以，马克思这一段话更完整的表述应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完整表达的唯物实践观就包含了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识。

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实践观中包含浓郁的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有以上有关“物种的尺度”的依据，而且在其他的论述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生态观的论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处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而包含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观念。他在论述人的生存与自然界的联系时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人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 (p95)}“人靠自然界生活”，这是一个亘古不变、不可动摇的客观事实。从人的肉体生活来说，人的生存所必须的食物、燃料、衣服和住房均来源于自然界。而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自然界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且是艺术、宗教、哲学等一切意识活动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3] (p95)}而且，马克思认为，作为人本身来说，是同一切动植物一样是有生命力、有感觉和欲望的自然存在物。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 (p167)}马克思在这里充分地肯定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属性，包含自然力、生命力、肉体的与感性的欲望要求等等。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同自然共存亡、同命运。但人的本质毕竟是其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然属性都要被其社会属性所统帅，而其社会性集中地表现为社会实践性。人只有通过“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社会实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p122)}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即使作为社会的人，其本质也要其实现与自然的统一。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以雄辩的事实阐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从而论述了人类起源于自然的真理。恩格斯指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2] (p510)}这就说明，人类是猿类祖先在劳动中逐步演化进步、发展而来，因而自然是人类的起源，动物是人类的近亲。同时，恩格斯还揭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的一些特性。首先是自然界的运动性和相互联系性。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2] (p492)}恩格斯在这里所

长时间内，在社会劳动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从总体上来说都是统一协调的。但私有制产生之后，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在社会劳动中自然与人出现异化，自然成为人的对立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诚如马克思所说：“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 (p97)}这里的异化包含人的身体、自然界、精神本质和人的本质等，自然界是其重要方面之一。首先，自然界作为生产产品的有机部分，在异化劳动中同劳动者处于异己的、对立的状态。马克思指出：“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3] (p93)}这就是说，工人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创造了财富和美，但这些却远离自己而去，自己过着一种贫穷、丑陋、非自然与非美的生活。其次，社会劳动中自然与人的异化还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与污染。本来，社会劳动是人的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异化劳动却使自然受到污染和破坏。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所谓“同人类无关的外部世界”观点时，谈到一切的自然都是“人化的自然”，工业的发展就使自然界受到污染，甚至连鱼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本质——清洁的水。他指出：“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它已经成为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3] (p369)}这就说明，现代工业的发展，使自然环境严重污染，被污染的河水不再成为鱼的存在本质，反而成为其对立面了，当然也就同人处于异化的、对立的状态。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异化劳动中人对自然的感受和感情的异化。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但马克思却敏锐地抓住了它。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觉的意识和欲望的实现，因此应该感到十分的幸福和愉快，但异化劳动却是一种强制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丧失、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所以劳动者在感觉和感情上是一种痛苦和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人对自然的感受和感情也会发生异化，即使是面对如画的河山和亮丽的风景，处于痛苦和沮丧状态中的劳动者也是绝对不会欣赏的。马克思指出：“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3] (p126)}这就是说，只有在完全排除了异化状态的劳动，人在劳动中才能真正处于一种幸福和愉快的状态，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便培养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从而真正欣赏大自然的良辰美景。这就使，在当代，工业生产成为人同自然联系的中介，成为人的审美力能否得到解放的重要标尺。马克思认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 (p127)}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恰恰是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否定，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大疏离，是对人的审美的感觉和感情的压抑。这就说明，大自然本身尽管具有潜在的美的特性，但如果人的审美的感觉被异化，也不会同自然建立审美的关系。这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剥夺了人应有的物质需求，而且剥夺了人的包括审美在内的精神需求。有鉴于以上所述异化劳动中劳动者的被残酷的剥夺、人与自然的空前对立，人的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扬弃异化、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关系的美好理想。马克思十分敏锐地看到了导致异化劳动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

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又说，“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
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3] (p124)}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使一切对象变成私欲所有，成为资本，才是劳动异化，特别是自然与人异化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中视为万能的货币的揭露就可充分看到这一制度对异化劳动，包括自然与人的异化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个特性：（1）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面，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2）这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在的能力。”^{[3] (p153)}以上，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货币是使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这种异化现象产生的“神力”。这种神力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利润、私欲和短期经济效益的不顾一切的追求，这恰是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环境的严重污染和自然与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所以，为了解决这种十分严重的异化劳动、自然与人的疏离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了“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一十分重要思想。他说：“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3] (pp124-125)}很明显，私有财产的扬弃之所以会成为异化的扬弃，马克思认为主要是感觉复归为人的感觉，需要丢弃了利己主义性质、对自然界的关系丢弃了纯粹的功利性，从而得到彻底的解放。这种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 (p120)}这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理论阐释，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1）共产主义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即是私有财产的扬弃；（2）这种扬弃是人的自觉性在保留以往发展全部财富的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复归，是一种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3）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由于包含着人这个最高级的自然存在物，因而等于人道主义；而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由于将人的自由自觉性延伸到自然领域，所以又等于自然主义；（4）共产主义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解决；（5）这就是人类从历史和自身局限中摆脱出来并得到解放的历史之谜的解答，但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否定之否定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从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是其主旨所在。这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人之异化现象及其解决的深刻思考，具有极强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意义。如果说，当代“深层生态学”是对生态问题进行哲学和价值学层面的“深层追问”的话，那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社会学的沉思，并将其同社会政治制度紧密联系。马克思这种沉思的当代价值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人与自然统一的哲学维度

生态审美观从其主要内涵是阐述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来说，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应成为哲学基础。这一自然观包含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唯心主义和强调人与自然联系性，人的科技能力在自然面前的有限性等等。十分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众所周知，恩格斯于1873-1886年仔细地研究了有关自然科学的重要问题的大量文献，并写

成了十篇大致完成的论文以及一百七十多个札记和片断，就是后来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论著的主旨在于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同时也是对自然科学领域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自然辩证法》的写作首先基于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特别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自然哲学规律，需要加以总结。同时，19世纪中期前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出现了神灵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热力学唯心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理论，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而当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下的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过度开采日渐严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科技能力进行哲学的审视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就是《自然辩证法》写作的背景和主旨。诚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2] (p485)}

对于这部理论界已有深入研究的论著，当我带着当代诸多生态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重新阅读时，真是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并且获得了许多新的体会。首先，我发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像某些人曾经理解的那样主要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支配。恰恰相反，恩格斯的重点讲的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批判“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对人的劳动与科技能力的有限性与自然的不可过度侵犯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读后深感对于当前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传统观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在谈到辩证法时，恩格斯给予明确地界定说：“阐明辩证法这门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2] (p484)}谈到自然界时，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2] (p492)}而且，恩格斯借助于细胞学说，从人类同动植物均由细胞构成与基本结构具有某种相同性上论证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批判了人类高于动物的传统观点。他指出：“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类在研究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蠕虫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4] (p337-338)}

恩格斯在这里把“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观点看作“唯心主义的矜夸”并给予“极端轻视”，这已经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有力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从比较生理学的科学视角，立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均由细胞构成这一事实，因而是十分有力的。不仅如此，恩格斯还从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进一步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同源性。他说：“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2] (p508)}他还从儿童的行动同动物行动的相似来论证这种人与自然的同源性。恩格斯指出：“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2] (p517)}恩格斯由此出发，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亦此亦彼”性，从而批判了形而上学主义者将人与自然截然分离的“非此即彼”性。而这种“亦此亦彼”性恰恰就是由于事物之间的“中间阶段”而加以融合和过渡的。他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一致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2] (p535)}由此可见，将人与自然对立的“人

类中心主义”不恰恰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违背辩证法而力主“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吗？但是，人类毕竟同动物之间有着质的区别，那就是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却能够进行有目的的创造性的劳动。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2] (p513)}正因此，动物不可能在自然界打上它们的意志的印记，只有人才能通过有目的劳动改变自然界，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 (p517)}19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的深化和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造成了两种情形，一是人类对自己改造环境的能力形成一种盲目的自信，二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日渐严重，逐步形成严重后果。恩格斯指出：“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2] (p520)}这就将自然环境的破坏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的追求紧密相联，不仅说明环境的破坏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紧密相关，而且同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紧密相关。同时，环境的破坏也同科技的发展导致人们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从而肆意滥发和掠夺自然的观念和和行为有关。恩格斯在描绘在科学的进军下宗教逐渐缩小其地盘时写道：“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2] (p529)}这就说明科学与宗教对自然界领域的争夺，最后科学志满意得地认为“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其所征服。但是，恩格斯从人与自然普遍联系的哲学维度敏锐地看到，人类对自己凭借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和科技能力对自然的所谓征服是过分陶醉、过分乐观的。他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 (p517)}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常被引用的话，说得的确非常深刻，非常精彩，不仅讲到人类不应过分陶醉于自己的能力，而且讲到人类征服自然的所谓胜利必将遭到报复并最终取消其成果，从而预见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激化以及生态危机的出现。恩格斯还由此出发对人类进行了必要的警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2] (p518)}这就是说，对自然的破坏最后等于破坏人类自己。恩格斯并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从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高度抨击了欧洲从古代以来并在基督教中得到发展的反自然的文化传统，进一步论述了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他说：“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内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2] (p518)}这是一段极富哲学意味的科学的自然观，也是科学的生态观，即使放到今天都极富启示和教育意义。恩格斯在抨击人们过分迷信自己科技的能力时并没有完全否认科技的作用，他相信科学的发展会使人们正确理解自然规律，从而学会支配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他说：“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 (p518)}由此说明，恩格斯并没有把科学放到与自然对立的位置上，而关键在于运用和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如何运用科学的武器去掌握并遵循自然规律，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这在当前讨论科技与生态的关系中，恩格斯的这些理论观点都是极具指导价值的。但是，恩格斯认为，最后解决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的途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地社会生产组织。”他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

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需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2] (p458)}恩格斯认为，人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失衡，实际上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一种异化，是向动物的一种倒退，而只有这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是人从动物中的提升，人的本质的复归，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开始。我想，在我们中国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历史时期，消除盲目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可能，只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就一定能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走和谐协调，从而实现人类审美的生存。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2] (p562)}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恩格斯讲的确非常深刻。由此我们也可认识到马恩生态审美观的不可免的历史局限性。因为 19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还处于发展的兴盛期，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没有突出出来。只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人与自然的矛盾才日渐突出，环境问题十分尖锐，人类社会不仅出现了马恩所揭示的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他们所未曾看到的生态危机。因此马恩对环境问题尖锐性的论述肯定还有所不够。但是，他们所作的包含生态审美意识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关系重建的论述都带有普遍的世界观的指导意义，不仅克服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且对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有所突破，成为我们今天建设新的生态审美观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还应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结合新时代的实际，吸收各有关重要成果，建设更加具有时代特色并有更加丰富内涵的生态审美观。

Marx and Engels and Eco-aesthetics

Zeng Fan-ren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ses and predictions of eco-aesthetic relationship by Marx and Engels are the resource for our thinking and exploring eco-aesthetic views in the new century. Their common project is to establish materialistic view of practice with eco-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cluding a respect of the inner values of species. The theory about “the overcoming of alienation” in *Economic-philosophic Manuscript, 1844* by Marx includes the idea of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materialistic view of nature established in *Natural Dialectics* and the like by Engels has becom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explaining the eco-aesth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 words: radical naturalism; independent value of natur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natural dialectics

收稿日期: 2003-11-04;

作者简介: 曾繁仁(1941-),男,上海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